

#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要素与运行逻辑

陈立豪

**摘要** 在城镇化推进与乡村社会转型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与运行受到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和地方社会生活实践的共同影响。其生成过程呈现为物质设施与意义体系的动态建构,涉及符号转化、代际协商与认同网络等核心要素。传统空间通过功能重构实现符号意义的现代转译,代际协商推动不同群体在记忆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形成调适关系,强弱关系交织而成的认同网络为空间秩序提供持续支撑。就运行逻辑而言,历史积淀为符号重构提供资源,制度资本与村社自主性在协商中塑造秩序,符号系统与价值体系的耦合促进文化生态的持续调适。基于B村的案例研究表明,制度供给与地方实践的有效对话、传统符号的创新转化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韧性与适应性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符号转化;代际协商;认同网络;乡村;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4-016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4ZDA080);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主科研项目(2025XWZY09)

快速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正面临传统功能衰退与新建设施空心化的双重困境。为回应这一挑战,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强化文化维度,推动治理逻辑从经济扶持转向文化培育。然而,政策设计与地方实践之间仍存在张力,制度目标与乡土传统、标准化模式与地域差异之间尚未实现有效衔接。鉴于此,本研究从历史、主体与价值三个维度切入,剖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要素与运行逻辑,并以B村为案例,通过理论推演与田野实证的相互印证,深化空间研究的学理阐释,进而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再生产的手段。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著名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将空间划分为空间实践(感知空间)、空间表征(构想空间)和表征性空间(生活空间)三种相互作用的维度<sup>[1]</sup>(P58-59)。空间实践指日常生活中对物质空间的利用与再生产;空间表征是规划者、权力机构依据知识与符号体系所构想的空间形态;表征性空间则是使用者通过想象、象征和情感赋予空间的生活体验和意义。三者的辩证统一揭示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动态互动,空间反映社会结构并深刻塑造社会过程。这一理论突破了将空间视为静态场所的传统观念,凸显了空间与权力、资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解释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sup>[2]</sup>(P IX)。该理论对人文社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成为解释社会与空间互动的的基本范式,并为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要素与逻辑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乡村语境中,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空间表征与表征性空间尤具启发意义。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等权力主体通过规划与制度安排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空间表征,表现为场馆建设、功能定位与政策嵌

入, 寄寓国家治理与现代化诉求; 另一方面, 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再创造这些空间, 赋予其情感与地方认同, 体现了表征性空间的生成逻辑。当官方构想与村民实践出现错位时, 公共文化空间可能被闲置或异化, 无法发挥其应有功能。这种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张力正是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乡村新建的文化广场、文化站在制度设计中寄托了文明传承与公共教育的目标, 但在现实中却常难以嵌入村民日常生活, 显示出制度供给与地方实践之间的断裂。这凸显了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要素与逻辑的必要性, 即探究空间在物质供给、主体实践与符号意义的交织中如何被生产与重构。

### (一)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的特征与挑战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土社会价值传承和社区认同的重要载体, 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寄托。传统乡村社会依托宗族祠堂、庙会集市等公共文化空间维系伦理秩序与文化生活。在快速城镇化和市场经济浪潮下, 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重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出现逆城市化趋势与乡村复兴运动, 学界提出“后生产主义”转型观点, 认为乡村功能正由农业生产转向消费、休闲与文化展示。这为理解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进的动力与逻辑提供了理论参照。

与此相对应,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的转变, 乡村发展模式逐步由以土地和农业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sup>[1]</sup>(P42-64, 243), 空间结构与功能持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呈现出三方面特征: 一是传统共同体空间的解体。随着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加剧, 宗族祠堂、村戏台等场所日渐冷清, 仪式性和礼俗性的公共功能不断弱化。具体表现为“熟人社会”原子化, 公共事务缺乏组织基础, 信任与协作弱化<sup>[4]</sup>(P141-147)。二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引入与异化。文化大院、文化站等设施在政策推动下大量兴建, 但因缺乏在地文化嵌入, 以及供给需求对接不准, 出现利用率低等现象<sup>[5]</sup>(P31-40)。三是乡村文化生活方式的个体化<sup>[6]</sup>(P54-58)。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渗透使农民价值观从集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 消费主义与城市文化扩散削弱了共同体意识, 村民文化认同感减弱<sup>[7]</sup>(P80-86)。同时, 传统节庆和民俗活动因迁徙流动与外来文化冲击而中断, 文化记忆呈现现代际断层<sup>[8]</sup>(P139-144)。这些转型特征相互叠加, 折射出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交汇时的张力与矛盾, 为理解空间生成提供了现实背景。

此外,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化背后有多重动力在作用。国家政权力量的介入与乡土自治的消长, 是塑造乡村空间的重要政治因素。计划经济时代通过人民公社等形式强制性改造了传统空间权力结构, 公共文化空间一度高度国家化; 市场化改革后, 资本下乡和农村产业转型带来了理性化改造,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受到市场逻辑重塑, 出现商业开发、旅游景区化等新现象; 进入21世纪, 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开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 政策资源下乡与农民主体积极性相结合, 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新一轮重组与复兴。这一系列演变赋予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以多元力量交织的复杂特质, 集中体现为政府主导规划、市场力量渗透与村民自发行动三者的嵌套<sup>[9]</sup>(P1575-1589)。

### (二)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的研究视角

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学界长期以来主要以生产机制为核心框架, 强调国家治理、市场逻辑和社区实践在空间建构中的作用。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生成与运行的视角, 则关注空间如何在历史、实践与意义层面动态形成, 强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 生产机制回答空间如何构建, 而生成与运行视角则回答空间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意义与秩序。二者在分析层次上递进, 前者提供物质与制度前提, 后者揭示空间如何通过历史积淀、主体实践和价值认同不断生成。

第一, 结构功能研究揭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化与社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相关研究强调, 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整体性社会变迁的一部分<sup>[10]</sup>(P847-859), 必须放在宏观结构背景下理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 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地缘松散的新型社区, 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随之变迁。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也由农业生产、礼俗教化逐步扩展到休闲、旅游与文化消

费<sup>[11]</sup>(P257-270)。部分学者借鉴后生产主义观点,认为农村地区已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土文化展示与旅游发展的载体。这一宏观视角揭示了空间的历史逻辑,但要进一步解释其意义与认同层面的生成,还需引入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第二,文化建构研究强调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文化活动的载体,同时承担价值传播与生活方式塑造的功能。这类研究将文化视为空间生成的基础,认为文化既是空间构建的内容,也是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sup>[12]</sup>(P50-66)。具体来看,文化活动、非遗传承与乡村创意产业有助于丰富空间的精神内涵;乡土文化中的伦理规范与共同体意识也为村民参与公共生活、重建社会纽带提供内在动力<sup>[13]</sup>(P93-97)。这一视角指出,文化建构并非空间的外部修饰,而是其生成与运行的核心要素,文化在符号系统与认同结构中的作用直接影响空间的持久活力。

第三,多主体协同研究指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行依赖于政府、市场与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互动。研究普遍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来自多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合作,需要综合考量政府、市场与村民等多方因素。政府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市场注入资金与运营活力,村民作为空间的直接使用者和创造者,其参与程度深刻影响空间的生机与持续发展<sup>[14]</sup>(P101-106)。协同视角倡导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推动国家意志与农民意愿在制度化的合作与反馈中相互融合<sup>[15]</sup>(P132-137)。

### (三) 研究缺口与创新方向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丰富成果,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与运行逻辑的解释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宏观叙事与微观实践之间尚未充分贯通。制度供给与资本力量揭示了空间外部的塑造机制,但就空间在日常实践中如何生成意义与价值,现有阐释仍然不足。第二,关于生成要素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文献多聚焦物质建构与功能定位<sup>[16]</sup>(P581-590),缺乏对历史积淀、主体互动与价值认同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整体逻辑的系统探讨。第三,实证支撑有待加强。部分研究虽然引入行动者网络等理论视角<sup>[17]</sup>(P130-139),但对于村委会、乡贤、返乡群体与文化团队在具体互动中如何塑造空间逻辑,仍缺乏扎实的田野材料作为依据。

本文致力于探究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在国家治理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各生成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其内在逻辑;第二,历史积淀、主体互动与价值认同如何共同塑造空间秩序;第三,如何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的相互结合与印证,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提供制度参考与实践启示。为此,本研究将从生成要素与运行逻辑两个层面切入,旨在构建一个兼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价值。

## 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要素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以地方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为基础,呈现为一种渐进过程。其动力来自自然生态变迁、社会文化重组与基层治理调适的共同作用,表现为文化要素的持续积累、功能结构的动态重组以及认同机制的逐步重构<sup>[18]</sup>(P28-38)。

从演进路径来看(见图1),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深植于地方历史与日常生活,并由此孕育出一套包括仪式传统、伦理规范、建筑形态与日常交往方式在内的文化核心体系。随着社会环境变迁,该体系的价值不断被重新审视。人口流动、产业转型与媒介技术普及带来了新的生活经验与文化需求,不同群体对空间的使用与理解也出现分化,公共文化空间由此步入认同分化阶段。在此过程中,部分传统要素因不适应现实而式微,另一部分则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一些新兴实践也被逐步纳入公共文化空间的日常运作,文化结构因而呈现出内部调整与外部拓展的双重趋势。

在此过程中,符号更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原有的文化核心通过建筑意象、仪式程序等具体符号与现实需求接轨,经过持续阐释与重构,逐渐形成一套更贴近当代生活的象征体系。这一过程既保留了历史记忆中的关键资源,也对其进行了必要的调适与精简,从而在维持文化要素可识别性的同时,增强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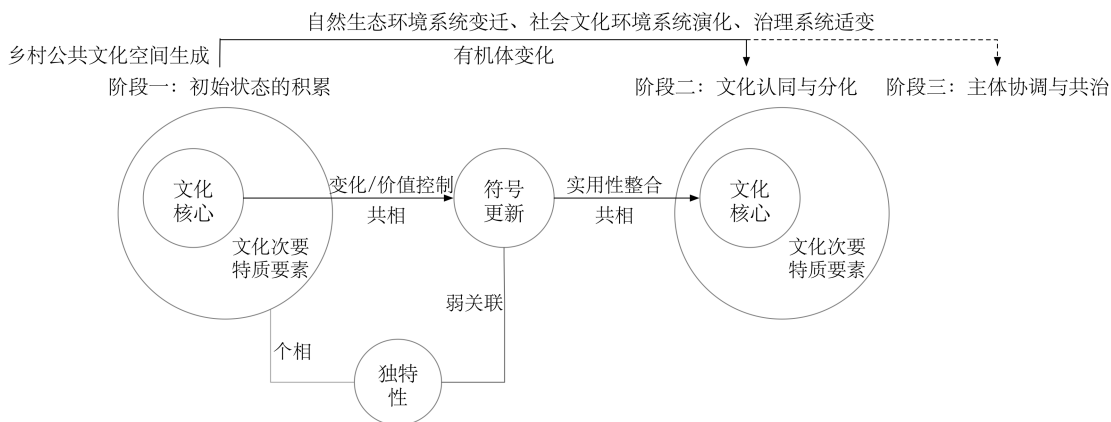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要素组织过程

对现实环境的适应性。不同群体在不同场景中形成的地域性实践,得以在符号更新的推动下被连接与整合,最终融入新文化核心。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本质上是其文化核心通过符号更新实现内在转化,并借助社会整合重塑认同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三个相辅相成的维度:符号转化承载文化意义的当代传递,代际协商实现价值观念的磨合调适,认同网络则支撑空间秩序的持续再生产。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一) 符号系统的功能演化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符号功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祠堂、庙宇、戏台、广场等场所,最初作为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物质设施出现。随着人们在此开展社会交往与文化实践,这些空间逐渐被赋予多样的象征意义。村民借助仪式、集会等集体活动,将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秩序符号,使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传递和延续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以传统祠堂为例,它在历史上既是家族血缘关系的象征场所,也承担着乡村治理与道德教化的功能。祠堂中的牌位、匾额、族谱等物件,以视觉方式叙述家族历史;祭祖仪式中的流程安排与行为规范,则将伦理秩序具象化为日常生活实践<sup>[19]</sup>(P93-97)。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活动,祠堂持续强化村民对宗族传统的集体记忆,使道德规范逐渐内化为日常行为的自然部分。这些仪式传递的象征意义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构成符号系统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

符号系统也非静止不变。伴随社会变迁,祠堂功能持续扩展,从单一祭祀场所逐步发展为集文化活动、村民议事、政策宣传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国家治理体系的延伸与基层治理方式的调整,使祠堂成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之一。其符号意义随之更新,从传统的“祖先祭祀之地”逐步转向“社区文化象征”,在延续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承担起现代公共职能。这种意义的重新建构,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维持活力的关键机制。

仪式活动在符号功能演变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春秋祭祀、年节庙会,还是修谱、修祠等集体行动,都已超越纯粹的文化活动范畴,成为持续赋予公共文化空间新意义的过程。每一次仪式都在原有符号系统中融入新的理解,使空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活态载体<sup>[20]</sup>(P225-231)。随着文化政策的推进与治理实践的深入,乡村地区陆续出现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这些新建场所的功能与意义,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与活动组织逐步确立。政策宣传、文艺演出、主题教育等活动在同一空间开展,形成多重意义的叠加。空间的象征性不再仅依赖宗族或宗教传统,而是借助制度化组织与公共参与持续更新。这一持续的意义建构过程,反映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符号系统的动态发展特征。

地域建筑与自然环境为符号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村口的古树、石桥、牌坊等场景,常成为仪式活

动的空间节点;祠堂院落、村道巷弄则承载着村民日常交往的逻辑。建筑布局的层次影响人们交往的密切程度,空间中的象征符号既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现实互动的舞台。空间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容器,更是通过建筑结构、环境氛围与社会实践的融合,不断被重新诠释的文化文本。

当前,传播方式的变革为空间符号的传递开辟了新路径。节庆活动、文化展演与旅游开发,使传统符号转化为可供展示与体验的文化景观。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日常实践得以记录与传播,符号意义跨越地域限制,获得更广泛的认知。空间不再只是本地村民认同与记忆的场所,也成为外界了解乡村文化的窗口。这种符号的扩展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资源与关注,对保持符号的真实性与地方特色提出了更高要求。

### (二) 价值导向的代际协商

价值导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中的关键变量,它反映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不同群体对空间功能、意义和使用逻辑的理解差异。这种差异在代际层面尤为明显,呈现出显著的认知分化。代际分化来源于各世代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和所承继的文化记忆,也受他们在日常实践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行为预期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空间使用方式和意义理解上的多元逻辑。

在年长一代村民的认知中,公共文化空间承载着宗族秩序、乡规礼俗和历史记忆等核心价值,是维系集体身份和伦理规范的重要媒介。祠堂、庙宇、古树、戏台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作为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通过持续的实践强化了公共规范的内化。这类空间实践具有突出的集体性和历史性,体现为一种嵌入式的文化记忆机制。相比之下,成长于快速城市化和媒介扩张环境下的年轻一代,其空间经验更倾向于即时性、个体化和娱乐化,更关注空间在休闲、社交、健身等方面的功能满足。文艺演出以及“打卡式”拍摄等活动已成为他们主要的空间实践形式。同一公共文化空间因而被不同代际群体赋予了多重意义,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认知差异。

乡村社会中道德规训方式和价值传递机制的转型,也重构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结构。在传统乡村,祠堂议事、节庆礼仪等以长辈为中心的活动构成了道德教化体系,公共文化空间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年轻人获取价值观念的渠道日益多元,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所承担的道德教育功能有所弱化。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组织文艺演出、专题讲座、政策宣传等活动,尝试将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相融合。尽管这些新兴空间不具备传统场所的神圣性,但借助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和公众参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村社会的价值传承机制,并为代际文化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

代际差异还表现在空间使用的行为模式和互动方式上。老一辈村民倾向于围绕公共文化空间开展仪式性、组织化的集体活动,以维护共同体秩序和伦理认同;年轻一代则更喜欢临时性聚集、自主组织及网络传播,将传统的实体空间转化为具有数字化场景和社交节点特征的交往场域。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记录并分享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实践活动,赋予空间以新的传播语境和文化内涵<sup>[21]</sup>(P24-45)。这一趋势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多元价值观与实践逻辑并存的复合体。

代际之间虽然存在张力,但在持续协商中也逐步形成新的空间共识。在国家战略和制度设计的引导下,这种代际差异正逐步转化为空间治理的积极因素。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文化遗产与空间活化的协同推进,在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设施的功能布局上,一方面保留能够满足集体活动的传统空间区域,另一方面引入契合年轻群体需求的设施与资源。政策层面鼓励青年通过返乡创业、参与乡村建设、组织节庆赛事等方式加入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为他们提供表达身份、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由此可见,代际协商已成为调节空间功能、激发文化活力、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

### (三) 认同结构的网络特征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体现在物质功能与价值取向层面,也反映在村民对空间的认同感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这种认同感部分来源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同时也受到现代制

度、跨地域交往与媒体传播所构建的弱关系网络的影响。两类关系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复杂多层次的认同结构。

在强关系网络中,以宗族、邻里和村社为纽带的文化亲密性是维系认同的核心要素。祠堂、庙会、节庆活动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长期以来作为乡村社会秩序与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象征。通过反复举行的仪式与日常交往,血缘与地缘关系在这些空间中得到确认与延续。集体议事、祖先祭祀、乡约执行等活动,均依赖于村民共同在场形成的文化亲密感。空间的物质形态与其象征意义紧密结合,构成乡村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随着人口外流与社会流动加剧,年轻一代对宗族与乡土关系的认同程度有所降低,传统空间功能逐渐弱化,以强关系为基础的认同结构面临一定挑战。

弱关系网络的兴起,部分弥补了强关系弱化所带来的认同空缺。在当代乡村,国家政策的实施、市场力量的介入以及媒体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与认同机制。志愿活动、兴趣小组、文化团队等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日益活跃,帮助村民建立起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社会联系。这些基于共同目标与兴趣形成的弱关系网络,使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承担更加多元的社会功能。理想的认同结构应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之间寻求平衡,保留传统网络带来的文化亲密感,并借助现代制度与文化实践注入新的凝聚力量。

国家政策进一步推动强关系与弱关系网络交织并存、彼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将公共文化空间视为强化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平台,借助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活动,政策力量为弱关系网络注入持续动力,也为强关系的文化基础带来新的内容<sup>[22]</sup>(P166-174)。红色教育、文明评比、文化展演等活动,强化了村民的共同价值认知,为不同世代与群体之间的认同融合提供了新纽带。制度安排与村民日常实践在空间中交汇,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认同重组与价值协商的重要场所。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得以在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之间实现认同的延续与更新。这种复合型的认同网络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社会转型中保持活力与文化内涵的重要基础。

### 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行逻辑

符号系统、代际协商与认同网络三个生成要素的分析,揭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成的基本面向。这些要素需要通过持续的互动与整合,才能在具体实践中驱动空间的真正生成。本部分借助乡村文化场景系统要素互动模型<sup>[23]</sup>(P74-85),重点考察其运行逻辑,即要素之间相互联结与协同的机制。研究将围绕三个核心机制展开:一是历史与现代的衔接,关注传统资源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实现转化;二是主体互动与权力配置,分析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博弈与协商形成秩序;三是符号意义的持续建构,考察文化价值如何通过实践被不断再生产(见图2)。

#### (一) 历史与现代的衔接

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中,历史构成其持续演进的重要基础。乡村生活本身具有自然的周期性,农忙与农闲、节气与节庆、家族礼仪等活动,在时间和场所上形成一种可预期的节奏。这种节奏赋予公共文化空间稳定且可重复使用的结构特征。现代治理方式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组织与资金支持,为乡村注入新的功能与秩序,同时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节律。乡村原有的时间结构维系了记忆与伦理的连续性,现代发展则带来制度化与创新的动力。两者的有效结合,使乡村文化生态得以避免僵化,也防止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丧失自身特质,最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一种韧性共生的关系。公共文化的意义建构,需要在延续传统与适应变化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平衡具体体现在生活节奏、空间使用与组织方式之中。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积淀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例如古祠堂、戏台、传统节庆等物质与非物质载体,它们承载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传统符号并未被简单抛弃,而是通过村民的日常实践与社区活动不断被重新诠释,在延续文化基因的同时,也回应了当代生活的实际需求。从理论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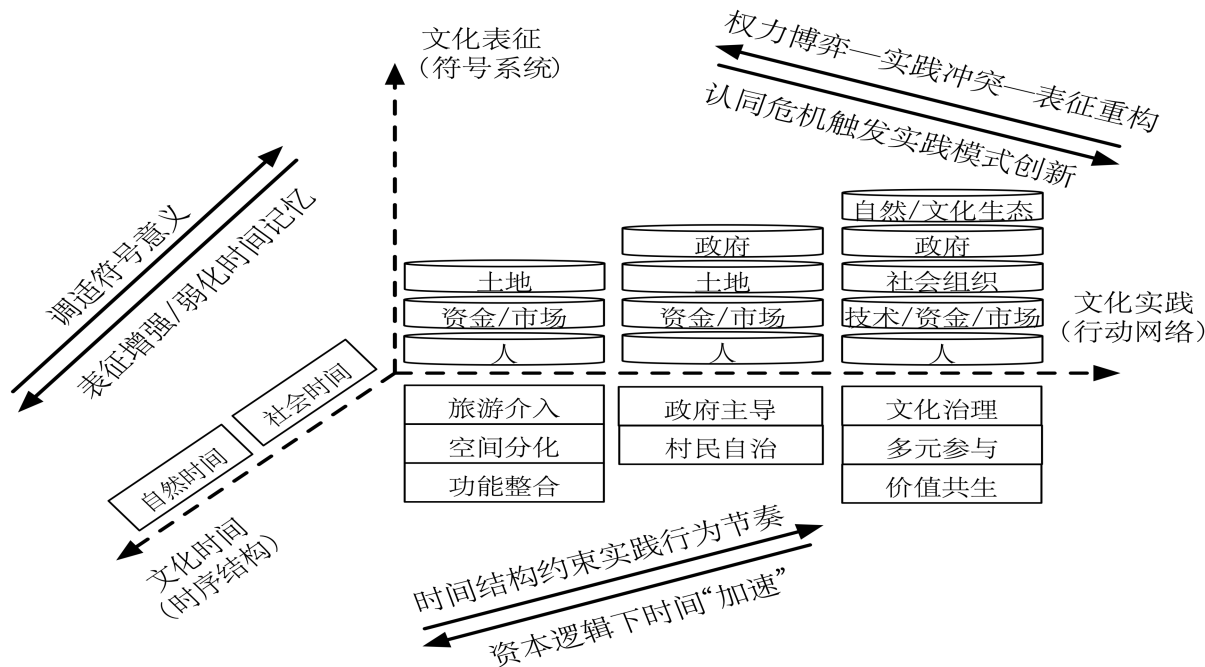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运行逻辑

看,历史记忆通过代际传递与生活实践,逐渐转化为空间中的象征元素;物质载体与仪式活动则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空间语言。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维系了文化认同,为乡村空间注入新的活力。

现代化进程也带来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流动、市场化进程以及旅游开发等因素,可能加速传统习俗的衰落,甚至导致文化遗产出现断裂。实地调研表明,现代性冲击确实可能改变原有的文化场景,但也可能激发新的符号与活动形式,从而推动空间形态的演变。这种融合为文化延续提供了基础,也催生出新的空间形态。不同乡村因历史底蕴和社会结构存在差异,其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文化系统在时间序列上的适应能力。

### (二) 主体互动与权力配置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依托于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弱关系网络存在稳定性不足的局限,易受政策调整或市场波动影响。当外部环境变化,基于兴趣或短期合作的社会联系可能减弱,制约公共文化空间的持续活力。为此,治理层面需要构建畅通的参与渠道和可持续的制度安排,通过常态化活动与规范管理增强社会连接的韧性。国家政策与乡村治理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并非外部强加的力量,而是通过精准的制度设计和文化引导,为弱关系注入持久动力,同时支撑强关系的文化基础,使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价值协商与认同重构的平台。政府借助资金投入、项目推动与设施建设,积极参与空间形态塑造,旨在传承农耕文明、改善文化服务。诸如“乡村春晚”一类新型公共文化实践,生动体现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精神纽带的重新连接。这些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的文化现象,彰显了文艺的业余性、大众性与非商业性,标志着农民在乡土文化转型中主体意识的回归<sup>[24]</sup>(P5-16)。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依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其关键在于外部资源与内生动力之间的有效平衡。外部资源通过整合与创新为乡村注入新活力,但其分配过程往往受到多方力量博弈的影响。因此,外部制度与资本的介入需充分尊重地方文化传统与现实逻辑,否则可能导致文化符号异化,偏离村民的真实需求。与此同时,乡村自身的文化实践与自主管理能力同样不可或缺。良性发展最终有赖于政府与村社之间形成有效配合,政策资源可以激活空间活力,但过于刚性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抑制村民的主动

性；乡村自治虽有助于强化文化认同，但其可持续运行仍离不开外部的系统性支持。

构建富有弹性的治理机制因而显得尤为重要，旨在协同外部支持与乡村自治。具体而言，可通过民主协商与利益共享机制，将外部资源有机融入乡村原有实践逻辑，使其成为村民共建共享的有利条件。依托村规民约与文化项目的共治安排，乡村在接纳政策资源的同时，也能保有自主发展空间，最终实现公共文化功能与乡村整体价值的动态协调。这种多方协商、有机互动的主体关系，正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石。

### （三）符号意义的持续建构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生成于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具体符号、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持续互动逐步形成。祠堂、戏台、传统节庆等物质载体与仪式活动，将抽象的地方文化转化为村民可感知、可体验的空间语言；村规民约与道德规范则为空间使用划定伦理边界，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现代乡村社会，传统符号体系与当代价值观正经历着深层次的融合。传统村规中尊老爱幼、互助协作的伦理原则，被转化为现代村民自治的具体规范，既延续了乡土精神的核心，也回应了当代治理的现实需求。传统建筑与民俗符号通过功能转换与意义拓展，实现了有效的现代转译，使空间意义从物质层面逐步延伸至集体认同层面。符号与价值的有机结合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也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催生出新的认同形式。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在符号意义的建构过程中，不宜简单套用城市模式，也不应固守僵化的保护思路，而需建立本地文化与外来资源之间的有效融合机制。长期以来，发展主义主导下的“文化下乡”等外部输入模式，因其常带有“他者”视角，往往难以在乡村社会获得真正认同。符号意义的有效建构，必须超越单一的外部供给逻辑，转向关注文化主体的实践过程、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及从文化传统内部生发出来的内生性特质。这意味着，符号的现代转译不能依靠外部观念的强行植入，而应立足于对群众自身文化实践的“重新发现”，使新的符号意义真正扎根于本地的社会生活与关系网络之中<sup>[25]</sup>(P101-108)。

## 四、案例分析：B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与运行

理论层面的要素辨析表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是符号系统、代际关系与认同网络在特定地方语境中不断互构的过程。下文选取B村作为实证场域，主要因为该村兼具传统空间遗存较为完整、开发位置相对边缘、多元主体持续参与等特征，能够较为集中地呈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中的关键机制。围绕祠堂、油厂、供销社等空间的改造实践，本文将考察符号转译如何展开，代际协商如何发生，认同结构如何调整，并在具体经验层面呈现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与运行状态。

### （一）案例背景与调研过程

B村位于皖南古村落集中分布区域，长期处于世界遗产景区辐射边缘。由于旅游开发推进较缓，村中宗祠、供销社、油厂等多类型空间形态保存较为完整，家族记忆与集体时代遗存也得以延续。近年来，随着外来乡建者与返乡群体陆续进入，围绕祠堂改造、油厂再生与合作社兴办等实践，村庄内部逐步形成由村“两委”、本地乡贤、返乡青年与文化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格局。不同主体围绕空间使用、经营方式与文化活动安排不断展开协商，代际互动与主体磨合也在日常实践中逐渐显现。随着公共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宗族、邻里和兴趣社群为纽带的强弱关系网络进一步交织，村民对在地人、返乡人和外来人的身份认知也随之调整，进而形成兼具开放性与内聚性的认同结构。研究团队于2024年6月至8月期间在B村开展了实地调研。采用的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文献收集。访谈对象覆盖了村干部、文化工作人员、返乡创业者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村民（见表1）。

观察内容涉及公共活动的组织过程、空间使用方式以及村民的日常参与。同时，研究也参考了当地政策文件、会议记录与媒体报道，力求从多角度还原B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运行状况。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及其编码

| 访谈编码       | 身份   | 性别 | 年龄 | 访谈日期       |
|------------|------|----|----|------------|
| 202407CM01 | 本地村民 | 男  | 63 | 2024-07-05 |
| 202407CM02 | 本地村民 | 女  | 47 | 2024-07-06 |
| 202407CM03 | 本地村民 | 男  | 52 | 2024-07-06 |
| 202407CM04 | 本地村民 | 女  | 58 | 2024-07-06 |
| 202408CM05 | 本地村民 | 男  | 45 | 2024-08-02 |
| 202408CM06 | 本地村民 | 女  | 66 | 2024-08-03 |
| 202407YK01 | 游客   | 女  | 36 | 2024-07-06 |
| 202407YK02 | 游客   | 男  | 40 | 2024-07-06 |
| 202407SH01 | 商户   | 男  | 42 | 2024-07-06 |
| 202408SH02 | 商户   | 女  | 31 | 2024-08-02 |
| 202407GB01 | 村干部  | 男  | 56 | 2024-07-05 |
| 202407GB02 | 村干部  | 女  | 41 | 2024-07-05 |

## (二) 空间改造与公共功能的拓展

B村保持着完整的村落格局,徽派民居与宗祠体系清晰可辨,供销社、老油厂等集体经济时期的建筑遗存也得以留存。B村长期处于旅游开发的边缘地带,这种“低曝光度”使其避免了过度景观化改造,为公共文化实践保留了可能性。在改造过程中,返乡人员与外来行动者遵循“保留原有结构”与“满足在地日常使用”的原则,重塑了三处典型空间的功能:将宗祠转化为书店与公共阅读空间,将废弃油厂改造为兼具住宿与餐饮功能的社交场所,将老供销社转型为手工艺展示与交易的复合场域。这些改造在保留历史构件与空间动线的基础上,叠加了符合公共价值的新功能。

以B村宗祠为例,改造过程完整保留了建筑肌理、仪式动线与家族记忆,使场所的象征意义得以延续。宗祠内部设置了二层图书阅览区与文创商品陈列区,并将附属牛圈改造为咖啡空间,从而将阅读、会客、休憩等公共活动引入原本以家族礼仪为核心的空间。运营初期,书店面临不同诉求的张力,政府希望其吸引景区客流,村民则坚持阅读服务应首先满足本地需求。经过持续沟通与实践,组织逻辑逐渐从“追求客流最大化”转向“适应日常使用”。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言:“我们希望书店服务于村里的阅读需要,而不仅仅是拉游客来。”(202407CM02)最终,宗祠实现了从礼仪空间到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转型,其历史意涵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延续。

废弃油厂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了大量榨油机、时代标语与旧工件,团队通过材料与光线的精心处理,将曾经的生产场景融入当下的公共体验。客房数量被严格控制,公共区域则被刻意放大,聚会、即兴表演、临时商谈与邻里往来成为常态。命名策略淡化精英审美,强调“轻松愉悦的日常生活”,降低了村民的心理进入门槛。厨房部分食材取自自有菜园与本地供应,雇佣本地村民与合作机制也将社区成员嵌入运营链条。这些安排使公共性在“可进入、可共用、可协商”的长期积累中逐渐形成。

改造初期,油厂片区曾因水资源使用引发邻里纠纷。随着共同相处时间的积累,村民逐渐意识到这一空间并非专属于游客,接受度随之提高;经营者也在噪声控制、排水处理与开放时间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一位村民对此评价:“如果没有主动去改造,这座老油厂大概率早就倒塌了,书店等文化设施也难以在村里稳定运营。”(202407CM03)空间由此免于废弃,并带来就业机会。

老供销社的更新实践采用了“百工十条”方法,注重“前店后坊”的空间动线设计,将展示、工艺演示与现场销售整合于连贯的空间序列中。这一作法跳脱了静态陈列的局限,超越了纯粹的商品化逻辑,使民间手工艺在“被看见、被使用、被交易”的完整流程中重新获得社会生命力。例如,以方言命名的精酿啤酒借助口味设计与故事叙述,成功将地方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在与倡导长效设计的机构合作后,村域产品逐渐摆脱对游客一次性购买的依赖,进入稳定的城市销售网络,建立起城乡之间持续

互动的文化与商品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对改造效果提出了朴素的衡量标准——“只要能赚钱,我们觉得好;文化意义自然会跟着好价格和好品质一起有的。”(202407CM04)这一态度使文化意义落实到定价、品质与地域特色之中。

### (三) 多元主体的协作方式

B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与运营,依托于一个由本地村民、返乡经营者与外来专业人士共同构建的多元网络。该网络的运行不依靠强制性组织结构,更多体现为邻里式的自然融入、带有温度的情感投入、持续的知识转化以及成本可控的轻量运营模式。许多外来人员与返乡者选择在村中长期居住。他们遵循乡村的作息节奏与礼俗传统,积极参与婚丧嫁娶与互助活动,将原本的项目合作关系逐渐转化为可反复调用的邻里情谊。一位书店合伙人自称“农民的孩子”,通过帮村民挑担、递烟、邀请共餐等具体行动,逐步融入社区并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关系(202408SH02)。由此,居住安排、场地使用与活动协作等事务得以沿着熟人社会的互动逻辑推进。

在地中介者的知识生产同样具有关键作用。以文化义工汪寿昌为例,他在书店承担口述历史记录、手绘创作与地方叙事三项工作。他将新出现的空间节点标注进乡村地图,把日常事件整理为年度纪事,还将“碧山八景”等手绘素材转化为可传播的文化产品,持续为公共文化空间提供稳定且可更新的叙事资源。与此同时,“黟县百工”调研项目持续开展,将学生、志愿者与村民的日常互助有效组织起来。学生通过密集走访完成基础素材采集,村民则在提供交通工具、引路接待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随着协作深入,调研记录、叙事整理、展览策划到产品开发逐渐形成链条,支撑工艺合作社的运营。

在就业与分工层面,公共文化空间创造了包括服务、保洁、烹饪、讲解与产品运营在内的多样化岗位,构建起收入、社群支持与居住安排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本地女性劳动者进入工艺合作社后,获得稳定薪酬与住宿条件。硬性福利与社区网络所提供的软性支持相互配合,有效缓解了家庭变动所带来的脆弱性。受访村民也提到,合作社工作为家庭提供了稳定收入与居所(202408CM06)。

### (四) 治理方式与秩序形成

在组织运行层面,当地老年人协会依托文化活动中心开展黄梅戏观影、报刊阅读与棋牌活动等常态化聚会。这些日常实践既维系着老年群体的社会连接,也为公共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可见的支撑基础。经过多轮修订形成的《乡规民约》,将伦理判断转化为可具体执行的条款,使公共文化空间的权责边界更为明晰。面对因网红化涌入的短期客流与艺术活动,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与公共服务的短板逐渐暴露。乡村开始探讨设施扩容与活动管理规范化路径,例如提议建立“乡贤联盟”平台,以程序化方式应对过度商业化与文化稀释风险。一位村干部指出:“我们计划在乡贤参与下,建立规范流程对外来项目进行监管,避免乡村文化传统被冲淡。”(202407GB02)在绩效目标、公共秩序与村民意愿之间,村“两委”始终保持着审慎节奏,将礼俗所维系的软性边界与程序所构建的刚性规范有机结合,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持续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 (五) 传播活动与日常生活融合

公共文化活动的持续传播依赖于叙事内容、实体产品与传播渠道之间的有效循环。以B村的书店与工艺合作社为例,其在节气时点举办的讲座、展演与手工体验,将时令知识、传统技艺与日常生活转化为可参与的教育场景。同时,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乡村文化产品获得了稳定的推广渠道。消费者在购买与讨论中提出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回流至乡村,推动展览内容与活动形式的持续更新。由此,叙事、产品与渠道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形成了可复用的传播循环,使公共文化空间得以超越短期效应实现持续传播。这一过程不仅未削弱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反而使村中的礼仪、记忆与实践重新回归空间的核心。通过再现、再利用与再融入,传统活动如结婚仪式、成人礼与节日聚会,逐渐转移到书店庭院、工艺社前厅或由“猪栏”改造的长桌上举行。本地食品、方言与手工器物成为传递情感的叙事载体,让参与者在仪式中真切感受乡土情谊。长期居住在村里的外来业主与返乡者亲身体会着慢节奏的乡村生活,而短期到

访的城市游客也能通过留宿,感知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

代际互动同样呈现出多元图景。老年群体通过戏曲、棋牌等活动维系共同记忆与礼俗边界;中青年一代在书店、酒吧与工艺社中展开社交与产品创新;亲子家庭则借助游学与体验活动开展轻参与式学习。正如一对父母所言:“带孩子参加乡村游学,能让下一代亲身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很欣慰。”(202407YK02)在同一空间内,不同世代的生活节奏彼此交织、相互支撑。

## 五、结论

本文系统考察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要素与运行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历史积淀、主体协商与价值耦合持续互动的产物,呈现出动态演进的建构特征。历史延续性为符号重构奠定了必要基础,制度资本与村社实践的互动塑造了空间的运行秩序,符号系统与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则维系了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形成了以下认识。

第一,文章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考察由供给与使用结果延伸至生成过程与运行逻辑,进一步揭示了空间形成的动态机制。第二,文章围绕历史积淀、主体互动与意义建构搭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将既有研究中相对分散的讨论纳入同一解释脉络,为理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提供了更具整体性的分析路径。第三,结合B村的经验材料,文章具体呈现了在地嵌入、协商调适与持续运作等过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比较的经验参照。

基于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可从制度衔接、空间活化与文化实践三个层面推进。在制度层面,可由村“两委”牵头,建立村民代表和空间运营主体共同参与的日常协商机制,围绕空间用途、活动安排、项目引入和利益协调等事项开展持续沟通,增强空间运行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空间层面,应根据传统载体的保存状况、使用基础与现实需求,统筹修缮保护、功能置换与日常维护,提升空间持续使用能力,使历史记忆在公共生活中延续。在文化实践层面,应立足村民日常经验,将节庆礼仪、手工技艺、地方饮食与乡土叙事转化为可持续开展的活动,并在本地用工、合作经营与持续反馈中积累稳定的运行基础。

未来研究可从两个方面继续展开。在社会资本持续进入、文化资源加快商品化的背景下,公共性的维系方式及其边界仍需深入讨论。不同区域在文化传统、治理基础与社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相关机制的解释效力也有待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检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基层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地方认同建构与城乡融合发展。将空间生成的动态逻辑纳入政策设计与基层治理实践,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韧性与适应能力。

## 参考文献

- [1]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2] 大卫·哈维.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黄煜文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3] 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等. 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 社会发展研究,2018,(1).
- [4] 刘启英. 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云南社会科学,2019,(3).
- [5] 巫志南.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精准供给研究. 图书与情报,2019,(1).
- [6] 吴理财. 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 探索与争鸣,2014,(1).
- [7] 赵霞. 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 中国农村观察,2011,(3).
- [8] 刘玉堂,高睿霞.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 江汉论坛,2020,(8).
- [9] 孙九霞,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地理学报,2014,(10).
- [10] 朱媛媛,罗源,王优聪等. 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 地理科学,2023,(5)..

- [11] 房艳刚,刘继生.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地理学报,2015,(2).
- [12] 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三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13] 何建华.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伦理学研究,2018,(4).
- [14] 王伟杰,纪东东.农民主体性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基于河南省七个村落的问卷调查.中州学刊,2013,(12).
- [15] 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东南学术,2018,(5).
- [16] 龙花楼,屠爽爽.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地理科学进展,2018,(5).
- [17] 吕慧妮,杨忍.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乡村转型及其空间生产研究——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人文地理,2023,(1).
- [18] 陈波,陈立豪.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 [19] 何建华.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伦理学研究,2018,(4).
- [20] 鲁可荣,曹斐浩.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重构及价值传承——以妙源村“立春祭”为例.浙江学刊,2020,(2).
- [21] 冯强,马志浩.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国际新闻界,2019,(11).
- [22] 贺雪峰.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23] 陈立豪,陈波.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机制研究:基于Z村的考察.中国软科学,2023,(11).
- [24] 赵月枝,龚伟亮.乡村主体性与农民文化自信:乡村春晚的启示.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2).
- [25] 沙垚.乡村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

## On the Generating Element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Chen Lih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generation and oper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are jointly shap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everyday practices of local society. Their generation entails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 and symbolic meaning systems, revolving around such core elements as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and identity networks. Traditional spaces realize the modern reinterpretation of symbolic meanings via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facilitates adaptive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mid heritage retention and practical demands; and identity networks constitut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strong and weak ties sustain the normative order for such spaces.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logic, historical legacies provides resources for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village-community autonomy co-shape spatial order through negotiations; while the coupling of symbolic systems and value systems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adaptation of local cultural ecosystems. The case study of Village B demonstrates that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local practice,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ymbols, and 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actor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Key words** symbol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identity network; rural areas; cultural space

---

■ 作者简介 陈立豪,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弘毅博士后,武汉大学场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